

“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

——“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机制研究*

孙 灿

内容提要：推动全球普惠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担当与使命，如何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平台中有效提升全球普惠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作者基于多元主体的参与互动和个人/人群的直观感受提出“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解释框架。“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是其中的解释变量。作为整体性抓手，“大援外”体系与“小而美”项目存在互构与相互赋能的关系。包含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的全球普惠发展是其中的被解释变量。“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通过优化民生体验、促进成果转化和提升共治水平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塑造了“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机制要义。鲁班工坊是“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的典范。研究表明，鲁班工坊有效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各价值内涵，使其具备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全球普惠发展最佳实践的可能，也印证了文章中微观机制解释的有效性。

关键词：全球普惠发展 “一带一路” 微观机制 “大援外”体系 “小而美”项目

作者简介：孙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本文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24年青年项目“‘小而美’项目增进‘一带一路’普惠发展的微观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一、引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全球普惠发展，“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①正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中国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球发展的赤字与分化。一方面，全球发展的资源供给和动能明显受阻；另一方面，全球发展的资源分配和布局明显失衡。中国希望通过推动全球普惠发展重塑发展资源的供需平衡，改变全球发展所面临的赤字与分化困局。第二，“全球南方”的崛起与自主。“全球南方”的崛起不仅体现在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还体现在其对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争取中。对战略自主性的追求也被视为“全球南方”崛起的重要信号。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理应坚定捍卫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全球发展迈向更加普惠的未来。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民生福祉的普惠增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将这种发展思路运用于南南合作，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发展经验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如果说中国推动全球普惠发展有着强烈的内外驱动力，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恰是践行上述发展承诺的最好平台，是观察中国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最佳窗口。这是因为，第一，“一带一路”是扎根发展的倡议。“一带一路”把互联互通与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作为核心内容，坚持发展的底色和导向，实施促进发展的合作项目并提供公共产品，致力于破解全球治理中的“发展缺位”难题。第二，“一带一路”是诚意合作的倡议。“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完全以自愿为前提开展合作，强调合作参与方的共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附加任何政治或经济条件，真正做到汇聚各方力量、践行多边主义。第三，“一带一路”是坚持开放的倡议。“一带一路”不是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而是开放包容的“大平台”。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重要国际组织宣布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②此外，开放性还体现在

^① 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2年6月25日，第2版。

^② 《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年11月24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F111101.html>。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对现有国际制度和机制的取代，而是对其进行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基于对上述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本文认为，中国已成为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从学理层面看，如何定义和解释全球普惠发展的真正内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抓手是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又是如何有效地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下文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二、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与“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相关的文献中。本文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普惠发展的关系，从如下三个视角予以呈现。

一是从思想视角出发，关注“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理念创新中的普惠性。吴志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创新全球发展理念，为促进全球普惠均衡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①余博闻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普惠包容的国际发展合作创新汲取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精华，不仅是中国本土知识的国际化，也是中西方知识的融合。^②迈克尔·邓福德（Michael Dunford）认为，“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的利益，并且，其普惠发展合作模式源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独特的历史观、中国曾作为殖民地的体验以及儒家自力更生和互利共赢的价值观。^③有一些学者表示，“一带一路”发展合作中的普惠性源于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④还有一些学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为实现共同

^① 吴志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发展治理》，载《当代世界》2022年第4期，第62～65页。

^② 余博闻：《“改革方法论”与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方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0期，第105～129页。

^③ Michael Dunford, “Chinese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BRI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61, No. 2, 2020, pp. 125-136.

^④ 李春林：《“一带一路”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模式创新》，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17页；Bruno Maçães, *Belt and Road: A Chinese World Order*,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9, pp. 9-38.

发展，将自身现代化发展经验与南南合作理念注入国际发展合作的努力。^①

二是从理论视角出发，关注“一带一路”发展合作运行方式中的普惠性。沈铭辉和沈陈认为，“一带一路”发展合作本质上体现了优势互补的“协调范式”特征，让发展合作的成果惠及全球。^②程诚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的使用，给非洲带去了包括全洲性基础设施改善在内的普惠性发展成果。^③类似的研究中，约翰内斯·佩特里（Johannes Petry）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中国的国有资产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从而与沿线国家形成相互依存的发展互惠关系。^④有一些学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开展功能性合作，特别是通过提供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类的公共产品，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⑤还有一些学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衔接和协调推动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进而落实全球普惠发展的使命。^⑥

三是从应用视角出发，关注“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具体实践中的普惠性。丁金光和张超认为，“一带一路”通过环保援助拓展国际环保市场、促进绿色发展，把中国人民利益同世界人民利益结合起来。^⑦姜安印和刘博认

① 袁正清、董贺：《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23年第5期，第4~34页；Bjørn Leif Brauteseth and Dan Banik, “Transplanting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at Will It Tak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5, No. 4, 2023, pp. 639-654.

② 沈铭辉、沈陈：《机制供给与“一带一路”发展合作》，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1期，第1~23页。

③ 程诚：《“一带一路”中非发展合作新模式：“造血金融”如何改变非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④ Johannes Petry, “Beyond Ports, Roads and Railways: Chinese Economic Statecraf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9, No. 2, 2023, pp. 319-351.

⑤ 吴泽林：《“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性逻辑——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的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第128~153页；田旭、徐秀军：《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128~154页。

⑥ 曹嘉涵：《“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载《国际展望》2016年第3期，第37~53页；Alejandro Rodiles,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alism and Its Many Types of Global Law: A Comparative Look at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ond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No. 3, 2023, pp. 367-390.

⑦ 丁金光、张超：《中国对外环保援助的战略重要性》，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第19~25页。

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推动集体和个人能源发展权的均衡普惠改善。^① 奥维格韦·埃格古（Ovigwe Eguegu）认为，中国利用数字“一带一路”推广进步可用的互联网技术，帮助非洲加快数字化进程。^② 有一些学者表示，“一带一路”发展合作以全球普惠发展为目标，将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转化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动能。^③ 还有一些学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合作方案具备对接的可能，由此将为实现全球普惠发展提供助益。^④

既有研究为我们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和应用启示，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没有完全凝练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内涵。相关学者只是在直接使用发展的“普惠性”或者在强调发展的“共同性”“均衡性”“包容性”等近义表述中，将“全球普惠发展”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没有深入挖掘其具体内涵和指涉，这容易造成概念上的分歧和理解上的困惑。二是缺少对多元主体参与的考察。相关学者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发展合作中国的责任承担及其普惠发展效应的产生，相对忽视了企业、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社会责任的履行及其普惠发展价值的释放。三是缺少对具体机制和对人的影响的分析。相关研究的关注焦点往往集中于“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对于所在国重大基础设施的增加、宏观经济数据的改善及国际发展地位的提升上，而较少关注广大民众获益的直观体验和切身感受。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由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并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拓展“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微观和细化的视域。

① 姜安印、刘博：《能源发展权：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再思考》，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53~66页。

② Ovigwe Eguegu, “The Digital Silk Road: Connecting Africa with New Norms of Digital Development”, *Asia Policy*, Vol. 17, No. 3, 2022, pp. 30-39.

③ 文春晖、徐海涛：《中国杂交水稻在非洲的技术积累及其可持续发展》，载《西亚非洲》2024年第1期，第131~151页；王翠梅：《共生式国际发展合作新范式下的中国对外技术援助——以菌草技术援外为例》，载《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1期，第59~72页。

④ 郭存海：《发展互鉴：构建中拉新型交流合作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2期，第24~41页；Bhaso Ndzendze and David Monya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nkages with the African Union’s Agenda 2063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view*, Vol. 11, No. 1, 2019, pp. 38-49.

三、“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解释

本文旨在探讨和建立“一带一路”对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影响机制，而理解国际关系研究的微观转向及微观基础成为建立特定问题领域微观解释框架的前提。系统和宏观理论存在的缺陷是国际关系研究微观转向的重要原因。泰尔·所罗门（Ty Solomon）和布伦特·斯蒂尔（Brent J. Steele）认为，一方面，宏大理论引导人们关注某些重要的特征或属性，却可能将学术注意力从涉及政治的人性上引开。另一方面，宏大理论关注安全和制度，将人类视为重新定义和概念化空间的原子结构中的一部分，而没有发展与公民日常生活接触和参与相关的研究。相比之下，微观理论聚焦于特定时空环境，试图发现个人和集体的能动性，而不是将人当作技术性的手段。^①

乔舒亚·科泽（Joshua D. Kertzer）进一步指出，微观基础的方法依赖于两个关键原则，其一关涉社会科学的机械论观点（mechanismic view of social science），即社会调查不仅评估因果关系，还提供具体解释。微观基础的研究包括探索塑造社会行为的具体细节或塑造过程中的微观要素，是打开“因果关系黑箱”的过程。其二是在较低的层次上进行机制分析。许多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微观基础研究倾向于将微观的理解置于个人层面，但微观基础的路径并不必然局限于人类行为的“第一意象”，也可能呈现于国家内部结构的“第二意象”中。^② 依据上述两个原则，本文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微观解释应包含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微观解释要摆脱体系层面的理论束缚，破除国家“黑箱化”的操作模式，将国内和跨国多元行为体引入解释框架；二是微观解释要从人的角度特别是个体层面的作用机制出发考察宏观社会现象，将普通人/人群的具体感受和所处日常情境纳入解释范围。

（一）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内涵

本文认为，全球普惠发展不应被视为不证自明，而应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以便准确理解其内涵指涉和提升方向。联合国经济和社

^① Ty Solomon and Brent J. Steele, “Micro-Mov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2, 2017, pp. 267-291.

^② Joshua D. Kertzer, “Microfound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4, No. 1, 2017, pp. 81-97.

会事务部发布的《不让一个人掉队：普惠发展的必要性》报告中指出，在消除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及实现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方面取得进展，是普惠发展进程的基本要素。^① 克里斯托夫·多夫费尔（Christoph Dörffel）和塞巴斯蒂安·舒曼（Sebastian Schuhmann）基于公平分配和更好的发展回报创建了全球普惠发展的多维普惠性指数（multidimensional inclusiveness index），认为普惠发展是一种关涉社会进步的发展，它是结合了公民的参与性赋权，并根据制度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促进人类福祉且内含发展能力的概念。^② 乔耶塔·古普塔（Joyeeta Gupta）和考特尼·韦格林（Courtney Vegelin）的研究也指出，发展普惠性的定义包含了社会、生态和关系成分，这种普惠性不是对“他者”的兼并，而是建立在承认和认知正义基础上对发展内容的重新定义。^③

所罗门和斯蒂尔的研究从空间、时间和情感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打开了微观世界的理解方式”，这对本文中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解构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空间维度不仅包括物质性的实践场所，也包括象征性的实践建构；时间维度用于探索生产个体和社会联系的时间结构和过程；情感维度具有跨越个体的流动性特征，并可以形成一种更广泛的集体结构。^④ 本文拟在既有文件和研究指向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的微观解释及其理解维度，解析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内涵构成（见表1）。

表1 全球普惠发展价值内涵的构成

微观解释：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考察；基于个人/人群直观感受的解释		
理解维度	价值类型	核心内容
空间维度	需求价值	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直接需求
时间维度	能力价值	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情感维度	共生价值	各行为体利益共生的参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Leaving No One Behind: The Imperative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UNDESA, 2016, <https://www.un.org/esa/socdev/rwss/2016/full-report.pdf>.

^② Christoph Dörffel and Sebastian Schuhmann, “What is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troduc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Inclusiveness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62, 2022, pp. 1117-1148.

^③ Joyeeta Gupta and Courtney Vegelin, “Inclusive Development, Leaving No One Behind, Justic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 23, 2023, pp. 115-121.

^④ Ty Solomon and Brent J. Steele, “Micro-Mov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267-291.

1. 空间维度：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

从一般意义上说，全球普惠发展关涉每个国家、每个阶层和每个人的发展福祉。但从客观形势上看，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全球发展版图的边缘地带，是全球发展的弱势群体，也是衡量全球普惠发展成效的主要对象。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严重的世界里，“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的说法并没有充分反映现实变化。尽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挑战国际发展的南北二元基础，但全球南方仍然是走向更为全面的全球发展的关键。全球发展要特别注意探讨地理变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对空间术语和发展的参考意义。

本文认为，从空间维度和微观解释出发，立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直接需求最能够反映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并将其视为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3 年发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在 110 个国家的 61 亿人口中，有 11 亿人（略高于 18%）生活在严重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中。撒哈拉以南非洲（5.34 亿）和南亚（3.89 亿）的贫困人口约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近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7.3 亿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行动对于减少全球贫困至关重要。虽然低收入国家人数仅占 MPI 所列人口的 10%，但这些国家却居住着 35% 的贫困人口。^① 可见，全球贫困人口仍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成为发展中国家民众最优先也是最直接的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仍会将改善医疗水平、增加入学机会及饮用水供给、安全住房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视为减贫需求中最迫切的选项。

2. 时间维度：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

全球普惠发展既直面当下，又关涉长远。体现长时段发展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强调发展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不应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造成危害。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演进，其逐步形成了包含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在内的三大内容，这也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支柱。可以预见，可持续发展仍会是一个动态变迁和深化拓展的过程。

^① “25 Countries Halve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within 15 Years, but 1.1 Billion Remain Poor”, UNDP, July 11, 2023, <https://www.undp.org/press-releases/25-countries-halved-multidimensional-poverty-within-15-years-11-billion-remain-poor>.

本文认为，从时间维度和微观解释出发，立足于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最能够反映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并将其视为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深入可持续发展议题会发现，与应对社会经济变迁和健康挑战相关的教育、培训和技能获取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可持续发展需要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为更大的发展和可持续性做出贡献，需要为他们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保障。科技创新是实现普惠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不仅为发达国家所倚重，也为发展中国家所青睐。近年来，非洲就强调要通过鼓励创新、促进创业和投资于研发来强化国家和区域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加速社会经济进步，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盟《2063 年议程》。^① 科技创新与应用要求更快的改进和传播，这也意味着必须要有更加熟练的专家、工程师和科研人员提供支持。

3. 情感维度：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

全球普惠发展无法自动实现，需要主动为之，其包含了全球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判断和实践思维，要求各类行为体能够用全球视野来思考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以推动共生发展。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以情感为基础——共同体内部形成共同情感，不仅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在更深的层次上实现了共享，还意味着共同体内部产生了自觉维护集体身份的力量。^② 这样，全球普惠发展因主体间共生关系的情感纽带被激发，各行为体在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中推进资源与功能的互联互通，实现利己与达人的有机统一。

本文认为，从情感维度和微观解释出发，立足于发展合作各行为体利益共生的参与最能够反映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并将其视为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流散”现象提醒我们，在审视共生共在的全球普惠发展时应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羁绊，更多关注非国家权威特别是“市场及市场操作者”的作用。^③ 我们既要关注全球治理中跨国及国内多元力量的参与程度，在共生发展中形成合力；还要关注它们的参与属性，在共生

^① “Africa’s Sustainable Growth Hinges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UNECA, March 3, 2023, <https://www.uneca.org/stories/africa%E2%80%99s-sustainable-growth-hinges-on-science%2C-technology%2C-and-innovation>.

^② 韦红、马赞菲：《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设》，载《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第166页。

^③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发展中强化共情思维，平衡好“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角色。^① 共生基础上的全球普惠发展认为，这两种角色并不必然引发冲突，各行为体完全有可能在遵守“社会人”约定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人”的发展价值。

（二）全球普惠发展的关键抓手

本文认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普惠发展的提升作用需要回归“一带一路”扎根发展、诚意合作、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本质。就“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研究命题而言，其内容仍较为宏大，只有明确其中的关键抓手，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抓手”多指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是实现既定目标所使用的政策工具、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② 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抓手的选择是在模糊和复杂的政策安排中确立关键点，也是各部门之间互动的必要支撑。^③ 这也契合了本项研究中微观解释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本文中抓手的选择还要尽可能满足微观解释中第二个方面含义的需要，即关注民生需求和建立日常叙事。综合上述两方面考虑，本文从结构—单元关系角度出发，将“大援外”体系和“小而美”项目视为全球普惠发展关键抓手的具体分析对象，并将它们分别界定为结构抓手和单元抓手。

1. 结构抓手：“大援外”体系

学界对构建“大援外”体系的呼吁由来已久，其背后体现的是援外资源吸纳与整合的逻辑。“大援外”体系源于大国援助进入战略性阶段和上升为国家治理内容的需要，是对外援助在战略上、资源统筹上和监管上的高度集中。^④ 围绕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全球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是“大援外”体系的主要任务。“大援外”的建设不仅要从机构体系上改变对外援助碎片化的格局，而且要从渠道方式上改变对外援助相对单一的局面，还要从国际合作上利用现在已有的各种有力机制，促进国家利益最大化。^⑤ 2018年

① 关于“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解释，参见陈小鼎、王翠梅：《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 ODA 政策比较》，载《当代亚太》2021 年第 1 期，第 79~105 页。

② 刘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抓手”》，载《学习时报》2023 年 1 月 30 日，第 2 版。

③ 薛金刚：《抓手：推动政策有效执行的策略工具》，载《中国行政管理》2024 年第 3 期，第 17 页。

④ 《李小云谈大援助体制：新型大国需要新型对外援助》，光明网，2017 年 2 月 9 日，https://theory.gmw.cn/2017-02/09/content_23677258.htm。

⑤ 《专家呼吁建立我国大援外体系，改变碎片化格局》，凤凰网，2018 年 2 月 28 日，https://news.ifeng.com/a/20180228/56360286_0.shtml。

4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成立，旨在以“一盘棋”思维推动中国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中国“大援外”体系的协调与整合目标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本文认为，“大援外”体系建设要在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扩展援外内容和形式及提升援外综合效应的基础上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助力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的行稳致远。具体而言，“大援外”体系囊括如下三方面要义。第一，“大援外”体系包含了多元发展主体的协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元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学校和社会组织等。从一般意义看，政府主要承担“设计师”的角色，企业主要承担“建筑师”+“金融家”的角色，学校主要承担“教育家”的角色，社会组织主要承担“活动家”+“联络人”的角色。而从实际运行看，他们的角色互有交叉和重叠，体现了不同行为体间的互动协作——项目的制定需要政府、企业和学校共同献计；项目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投入、企业融资和社会组织筹资；项目的执行评估有赖于学校和企业的实践加持与社会组织的反馈。多元主体间的角色联系与互动促使它们在发展合作中形成合力。第二，“大援外”体系包含了多方发展力量的对接。这意味着中国所倡导的发展合作实践既要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相关发展倡议和行动目标进行对接，又要与发展合作对象国的基本制度、组织结构及相关平台进行对接，还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业比较优势和从业标准进行对接，推动发展合作的国际化进程。第三，“大援外”体系包含了多重发展方式的结合。除了传统的政府间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等方式外，“大援外”体系还倡导调动国内外相关主体和机构共同参与发展合作的项目融资与技术援助等。

2. 单元抓手：“小而美”项目

近年来，“小而美”逐渐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流行语和中国援外的新思路。^①“小而美”项目的全称是“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项目。因此，实施效率高和聚焦民生发展是“小”和“美”最基本的内涵。习近平主

^① 与“小而美”类似的小型援助项目方案并非中国独有，一些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以清洁能源领域为例，日本援助太平洋岛国的电力项目和德国援助印尼的“点亮千岛”项目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其援助呈现出以地区规划和议题研究为引领，强调援助的品牌效应及注重培育当地人脉等特点，但也存在重倡议、轻落实的不足。中国可借鉴其优点，突出“小而美”项目因地制宜的特征和自己的品牌效应，同时也要谨记“小而美”项目重在落实，切不可使其成为空中楼阁。

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小而美的项目，是直接影响到民众的。今后要将小而美项目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事项，加强统筹谋划，发挥援外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形成更多接地气、聚人心的项目”。^①自2021年以来，一大批“小而美”的项目获得立项实施，其中，菌草、青蒿素、杂交水稻、鲁班工坊等都已经成为优质的援助品牌和“小而美”项目的典范。^②未来，“小而美”项目将和标志性工程一道，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的推动力。^③

新华社发布的《全球发展倡议实践成就与世界贡献》智库报告指出，“从个体的人，到家庭、社区，推及自然和人文环境，全球发展倡议正在从一幅幅规划蓝图，化为一项项‘小而美、惠民生’的务实合作成果”。^④本文认为，作为全球发展重要载体的“小而美”项目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小而美”项目更加强调民生援外。与不少西方国家将对外援助与（西方式）民主制度“捆绑销售”的模式不同，中国历来强调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小而美”项目直接面向所在国民众，把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增进“心联通”作为根本目标，彰显了对外援助服务于民生改善的特征。第二，“小而美”项目更加强调精准援外。“小而美”项目把脉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具体诉求，具有投资少和速度快的实践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收获成效，并可依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做出灵活调整，实现了援助效果和援助效率的统一，更

① 《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1月22日，第1版。

②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举行持续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和援外事业新闻发布会（全文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2023年10月31日，http://www.cidca.gov.cn/2023-10/31/c_1212295737.htm。

③ 对于“小而美”项目中的“小”意指多大规模，当前政界和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本文更偏向于认为，“小而美”中的“小”是一个相对概念。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就包括开展务实合作，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由此可以推断，“小而美”项目中的“小”是相对于标志性工程而言的“小”。另外，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在2021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提到，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既要推动“小而美”项目，又要适度稳妥安排成套项目，做到大小项目平衡推进。由此也可以判断，“小而美”项目的“小”是相对于大型成套项目而言的“小”。参见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2版；罗照辉：《大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1期，第14页。

④ 《全球发展倡议实践成就与世界贡献》，新华网，2023年9月20日，<https://www.xhinst.net/zkyjcg/research/index.html>。

加精准有力地服务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第三，“小而美”项目更加强调精致援外。“小而美”项目多集中于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和志愿服务等领域，在关注硬件投入的同时更为注重与国际标准和所在国政策、规则等软件层面的对接。“小而美”项目普遍关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致力于优化援助的生态属性，凸显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

3. 结构—单元抓手的互构

在厘清全球普惠发展的结构抓手（“大援外”体系）和单元抓手（“小而美”项目）各自的含义之后，有必要进一步阐释关键抓手完整的内在逻辑。就推动全球普惠发展而言，结构抓手和单元抓手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并通过具体对象内容的相互赋能得以实现（见图1）。澄清这种内在逻辑对于将“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作为一个整体解释变量来看待也实属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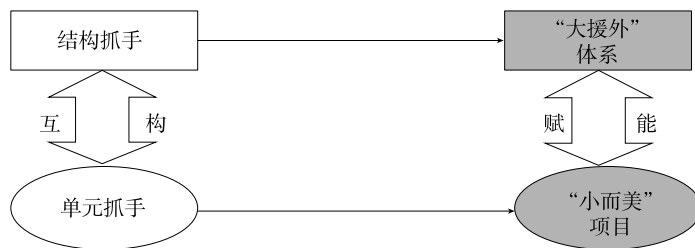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普惠发展关键抓手的内在逻辑

说明：图中灰色方框代表本文中结构抓手和单元抓手的对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从“大援外”体系对“小而美”项目的建构与赋能看，一方面，“大援外”体系为“小而美”项目提供了更多样的形式载体和更充足的资源支持。在“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不仅具有单纯的援助属性，而且具备多样的发展合作属性，可以嵌入到商业性的贸易和投资环节，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在“大援外”体系中，多元主体的参与使得“小而美”项目可以汲取各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获得更具竞争力的发展潜能。另一方面，“大援外”体系为“小而美”项目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和更持久的运行保障。在“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具备与成套项目及产业链对接融合的可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还将获得包括事前、事中、事

后全周期的运行支持，促使“小而美”项目拥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小而美”项目对“大援外”体系的建构与赋能看，一方面，“小而美”项目为“大援外”体系的发展合力提供了更加聚焦的发展主题。尽管“小而美”项目投资少、规模小，却与民生改善特别是民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直接相关。以“小而美”项目作为优先合作事项，使得“大援外”体系能够更好统筹规模和效益，强化援助与发展合作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小而美”项目为“大援外”体系的发展合力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落地转化。“小而美”项目对于各发展主体而言有着较高的参与感，这意味着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都能够在“小而美”项目上亲力亲为。同时，“小而美”项目因合作主题具有广泛的国际共识而属于低敏感合作领域，也是和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开展三方合作的重要突破口。这种高参与度和低敏感性意味着“小而美”项目拥有更大地被落实和转化的可能。

（三）全球普惠发展的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全球普惠发展的关键抓手及其价值内涵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进一步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利于我们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是如何有效地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

第一，“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通过优化民生体验增进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主要体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直接需求。“小而美”项目是直接作用于民生改善的援外力量，“大援外”体系又在丰富参与主体、客体和方式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民生援外的导向。因此，“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具备成为影响全球普惠发展需求价值实现的可能解释变量。本文拟将“民生体验的优化”作为这一解释过程的中间步骤，在民生“三感”^①的获取中检验民生体验优化的落实情况，特别关注“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如何在“为民”和“便民”的服务中有效回应了发展中国家民众最基本和最迫切的需求。

第二，“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通过促进成果转化增进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主要体现为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小而美”项目是精准作用于自主发展的援外力量，“大援

^①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被称为民生“三感”，体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的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外”体系又在创新运用理论、实践和方法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授人以渔”的导向。因此，“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具备成为影响全球普惠发展能力价值实现的可能解释变量。本文拟将“成果转化的促进”作为这一解释过程的中间步骤，在本地化人才^①的培养中检验成果转化的落实情况，特别关注“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如何在“效果”和“效率”的共进中有效提升了个人获取科学知识和掌握实操技艺的能力。

第三，“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通过提升共治水平增进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主要体现为发展合作各行为体利益共生的参与。“小而美”项目是细致作用于发展合力的援外力量，“大援外”体系又在有效联结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合作发展的导向。因此，“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具备成为影响全球普惠发展共生价值实现的可能解释变量。本文拟将“共治水平的提升”作为这一解释过程的中间步骤，在协同关系^②的培育中检验共治水平提升的落实情况，特别关注“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如何在“硬件”和“软件”的对接中有效构建了各发展合作主体共商共建共享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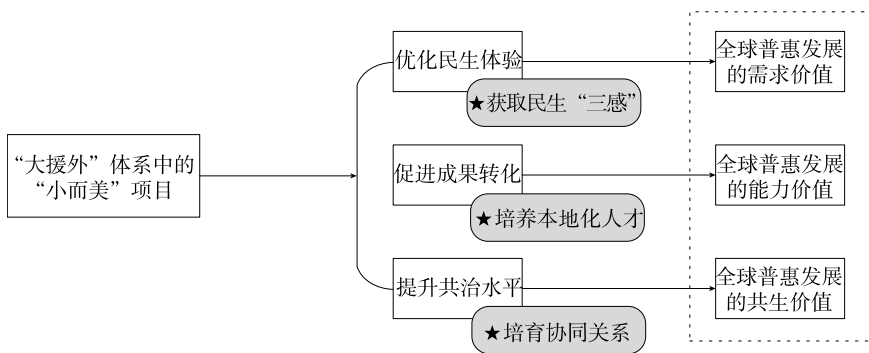


图2 “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作用机制

说明：图中灰色方框代表各中间步骤的核心可操作化指标，右侧的虚线方框表明全球普惠发展的三项价值内涵实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本地化人才了解当地情况，知晓当地需求，对科技成果转化有着在地经验和认知，是推动成果转化有效落地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② 协同关系的本质是各参与主体在目标和利益上形成共识并产生良性互动，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利益协调是协同关系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达成共治和防止走向“碎片化”治理的关键。

综上，全球普惠发展的作用机制得以呈现，这也是“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微观解释的中心环节（见图2）。本文的基本逻辑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依托“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这一整体关键抓手，在优化民生体验、促进成果转化和提升共治水平等中间步骤^①的作用下推动全球普惠发展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的不断增进。相应地，全球普惠发展价值内涵各自所承载的核心内容得以不断实现和改进，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鲁班工坊的普惠性发展合作

本节以鲁班工坊为个案，在具体实践中检验上述全球普惠发展的作用机制。选择鲁班工坊作为研究个案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第一，鲁班工坊首创于2015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才开始实施的“小而美”项目。相对于其他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就已经开始运作的“小而美”项目，鲁班工坊更能凸显“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效用。第二，鲁班工坊最初源于中国的地方探索，而后正式上升为国家项目并逐渐成为对外交往的“国家名片”。从地方实践到国家项目，鲁班工坊的推进历程表明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具备成为推动全球普惠发展力量的可能。第三，鲁班工坊是中国“小而美”项目的优先事项，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将“在国外推动鲁班工坊建设”作为2024年全国“两会”的提案，同时指出国合署将继续加大对“小而美”项目的帮扶力度。^② 综上，鲁班工坊具备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全球普惠发展最佳实践的可能，本节将对此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以展现鲁班工坊普惠性发展合作的微观作用机理。

（一）鲁班工坊：“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的典范

鲁班工坊是由天津市原创，并率先推动和组织实施的中国职业教育对外援助与发展合作的品牌项目。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鲁班工坊已在世界多国多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上“大援外”体系

^① 优化民生体验、促进成果转化和提升共治水平三项中间步骤的核心可操作化指标分别是获取民生“三感”、培养本地化人才和培育协同关系。

^② 《国合署署长罗照辉：在国外推动鲁班工坊建设》，《中国日报》中文网，2024年3月6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403/06/WS65e82fe7a3109f7860dd43bd.html>。

中“小而美”项目的典范（见表2）。

鲁班工坊案例符合“大援外”体系的建构要义。第一，鲁班工坊建设包含了多元发展主体的协作。《鲁班工坊建设规程》指出，鲁班工坊是指中国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在境外单独设立，或同外国政府、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合作设立，以境外公民为主要对象，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教学机构或者项目。^① 第二，鲁班工坊建设包含了多方发展力量的对接。鲁班工坊项目在理念、行动和目标等方面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还被非盟总部人力资源开发委员会设立为面向整个非洲的技术技能人才培训中心。鲁班工坊确立的多个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已获得合作国教育部批准，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② 多国发起成立的“中非欧中医药鲁班工坊合作共同体”旨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经验，全面服务中医药和中医技术的国际化发展。第三，鲁班工坊建设包含了多重发展方式的结合。已建成的鲁班工坊多依靠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而多元筹资机制也是其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鲁班工坊还体现了一种协同整合政府、学界和产业界资源的方法以促进技术转移，赋予个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民众个体在快速变化的行业中茁壮成长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鲁班工坊案例也符合“小而美”项目的内涵指涉。第一，鲁班工坊建设更加强调民生援外，在培养国际化本土技能人才、促进各国民心相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鲁班工坊将按照“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的建设思路，完善内涵式发展工作机制。^③ 笔者认为，这种内涵式发展工作机制的根本落脚点在于直面民众本位、直击民生福祉。第二，鲁班工坊建设更加强调精准援外，精准对接中外各自需求。印尼鲁班工坊为中资企业培养了超过500名本地化技能人才，还使这些毕业生的薪资水平超出当地月平均工资2倍以上。^④ 鲁班工坊选址灵活、可操作性强，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仅耗时86天便

① 《鲁班工坊建设规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网站，2022年4月14日，<https://www.ceai.edu.cn/uploads/attached/file/20220415/415051197612224.pdf>。

② 《“一带一路”上的技术驿站》，载《中国教育报》2023年10月13日，第3版。

③ 《鲁班工坊建设专家委员会成立》，中国教育部网站，2023年4月12日，http://www.moe.gov.cn/jyb_zzjg/huodong/202304/t20230412_1055389.html。

④ 《花开“一带一路”，鲁班工坊赋能“走出去”企业高质量发展》，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网站，2024年7月23日，<http://www.ypi.edu.cn/2024/0724/c2256a86141/page.htm>。

完成教学场馆的改建和装修工程,^①充分体现了其实施的高效率。第三,鲁班工坊建设更加强调精致援外。《鲁班工坊建设规程》指出,鲁班工坊应当遵守中国与所在地法律,尊重中外文化和公序良俗,不以鲁班工坊的名义参与政治性、宗教性等活动。^②鲁班工坊建设以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为依据,通过“四递进”逻辑^③实现国际化专业标准的落地生根。鲁班工坊致力于推广绿色生产和制造理念,将环保纳入成员主体责任,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预期作为检验办学成效的重要方面。

表2 “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的典范——鲁班工坊案例

结构/单元抓手	要义/指涉	鲁班工坊的对应内容
“大援外”体系	多元发展主体的协作	院校、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
	多方发展力量的对接	对接联合国、非盟等国际组织; 对接所在国国民教育体系; 对接发达国家比较优势
	多重发展方式的结合	多元筹资机制;促进技术转移
“小而美”项目	民生援外	民心相通;内涵式发展
	精准援外	符合中国与所在国人力资源需求;实施效率高
	精致援外	遵守中外法律和文化习俗; “四递进”落实国际化标准; 绿色环保的理念与责任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鲁班工坊建设规程》《鲁班工坊运营项目认定标准(试行)》、鲁班工坊研究和推广中心成果及其他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鲁班工坊的运作实践生动诠释了“大援外”体系对“小而美”项目的建构与赋能。从形式载体和资源支持来看,鲁班工坊遵循产教融合的原则,实施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的“五业联动”,发挥政、行、企、校、研的“五方携手”。^④能够真正做到凝聚合力、取长补短。从施展空间和运行保障来看,鲁班工坊与产业园、港口经济和自贸区等已形成紧密联结,成为国际化投资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鲁班工坊实行项目制管理,每三年为一

① 《让中国工匠精神沿着“一带一路”传下去》,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8月2日,第6版。

② 《鲁班工坊建设规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网站,2022年4月14日, <https://www.ceaie.edu.cn/uploads/attached/file/20220415/415051197612224.pdf>。

③ “四递进”逻辑,参见吕景泉等:《鲁班工坊——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创新实践》,载《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25期,第89~90页。

④ 杨延主编:《鲁班工坊建设标准研究》,中国铁道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2页。

个项目周期。项目期满，符合质量保障条件的，可以续接下一个项目周期。^① 鲁班工坊的运作实践也生动诠释了“小而美”项目对“大援外”体系的建构与赋能。从聚焦发展的主题来看，鲁班工坊强调办学基础的适应性，即符合所在国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战略，开设专业满足所在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需求。鲁班工坊还是紧缺型技能人才培养的“摇篮”，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从操作性的落地转化来看，根据鲁班工坊研究和推广中心对中外企业的一项综合调研结果，78.95%的企业参与到鲁班工坊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中，94.74%的企业为鲁班工坊教学实训提供过技术支持，84.21%的企业为鲁班工坊提供过实训设备支持，63.16%的企业在校企合作中为鲁班工坊提供过实训教师。^② 这表明，以企业为代表的发展主体具有较高的参与度。以职业教育为切入点，鲁班工坊也具有更高的国际共识和低敏感度。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指出，鲁班工坊更侧重于个性化的技能培训，其敏感性和争议性较孔子学院低。^③

（二）鲁班工坊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作用解析

鲁班工坊是“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的典范，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一项关键抓手。实践中，鲁班工坊以务实行动在增进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方面做出了表率。

1. 鲁班工坊与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

满足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直接需求是鲁班工坊的首要目标。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由工人的技能配备与特定工作所需技能之间差距而形成的“技能鸿沟”（skills gaps）已对发展构成了相当大的制约。因此，鲁班工坊的专业建设标准制定特别注重所在国的实际发展需求和人才需要。^④ 以尼日利亚电气电子工程专业鲁班工坊为例。该国对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具有迫切需求，鲁班工坊聚焦电气电子工程专业，培训的人才直接服务于尼日利亚经济社会的发展。^⑤ 鲁班工坊吸纳了多种发展主体的共同参与，利用各自擅长的工作方式

^① 《鲁班工坊建设规程》。

^② 《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鲁班工坊》，北方网，2022年6月6日，<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22/06/06/052745645.shtml>。

^③ “China is Educating Engine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Economist, October 19,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3/10/19/china-is-educating-engineers-around-the-world>。

^④ 参见杨延主编：《鲁班工坊建设标准研究》。

^⑤ 杨延主编：《鲁班工坊建设标准研究》，第12页。

推动其深入发展中国家的“民生洼地”，面向基层民众的直接需求。埃塞俄比亚素有“咖啡的故乡”之称，当地很多人以咖啡种植产业为生。然而，由于自动化程度不高，埃塞俄比亚咖啡生产的诸多环节仍要靠手工操作来完成，这也限制了咖啡产量的提升。针对这一问题，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联合天津某智能设备公司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参与鲁班工坊的教学培训，帮助鲁班工坊对接当地咖啡生产，更加精准和快速地识别咖啡豆和进行选果分类，真正实现了按需施教和对接当地的用人需求。^①

主流新闻媒体关注了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的鲁班工坊项目是如何给发展中国家民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肯尼亚马查科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彼得·穆斯约卡（Peter Musyoka）认为，鲁班工坊激发了他对计算机，尤其是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兴趣，使他明白了如何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② 这是鲁班工坊为当地民众带来的真实获得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南非鲁班工坊运用 3D 打印技术开发出一种防护面罩，免费分发给相关工作人员和机构。鲁班工坊还设计出一款空气质量检测应用软件，为当地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持。^③ 这是鲁班工坊为当地民众带来的真切安全感。吉布提鲁班工坊学员代表艾沙（Aisha）表示，通过学习，自己已在亚吉铁路的运营和管理岗位实习了三个多月，没有什么比梦想成真更让他高兴的了。^④ 帮助非洲青年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这是鲁班工坊为当地民众带来的真正幸福感。总之，作为“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鲁班工坊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民众获取民生“三感”中优化了民生体验，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

2. 鲁班工坊与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

助力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是鲁班工坊孜孜以求的目标。国家

① 《“一带一路”跨山海·双城记 从天津到亚的斯亚贝巴 鲁班工坊筑梦非洲匠心》，央视网，2023 年 10 月 16 日，<https://tv.cctv.com/2023/10/16/VIDEQolbDydlzhJKYUZgqVx231016.shtml>。

② “Kenyan Universities Embrace Chinese Luban Workshop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Modern Skills”，Xinhua，July 10，2024，<https://english.news.cn/africa/20240711/2b195f5879864837b2c18d3ba51207a5/c.html>。

③ 《“这样的工坊越多越好”》，载《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8 日，第 3 版。

④ “Thanks to Luban Workshop, Young African Man Fulfills His Dream”，China Daily，May 30，2023，<https://govt.chinadaily.com.cn/s/202305/30/WS64759b32498ea274927bc264/thanks-to-luban-workshop-young-african-man-fulfills-his-dream.html>。

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指出，鲁班工坊依靠一大批中国职业学校教师涉重洋，手把手将职业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当地青年。^①这种“传帮带”机制本质上就是一种“技术造血”，目标是增强所在国民众自主发展的能力。在导师、学校和企业等多主体的良性互动下，鲁班工坊将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②作为教学模式的核心内容，推动应用型 and 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培养。作为EPIP的一项重要成果，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学员在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赛中取得了一金两银两铜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该国在世界级技能比赛中的新突破。^③可见，鲁班工坊为每个认真参与并完成培训的学员提供了可持续性的竞争力优势和更加光明的未来。

鲁班工坊塑造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在于推动整个教学培训体系的本土化建设及对本地化人才的培养，如此才能真正增强“造血”能力和实现自主发展。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的中方教师团队将工程实景教学录制成视频，在英文版教学视频的基础上创新教学思路，邀请当地母语团队撰写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视频脚本，使其更容易被本地学员领会和接受。^④鲁班工坊坚持“本土师资培养先行”的理念，为此采取“双向奔赴”的形式开展EPIP师资培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⑤作为鲁班工坊本土师资的代表，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副教授托希尔·扎利洛夫（Toshir Zalilov）深刻领会到鲁班工坊所带来的“效率革命”——使用旧设备需要15天才能完成4公顷面积的校园测绘制图，使用鲁班工坊的新设备只需要3个小时。^⑥总之，作为“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鲁班工坊在帮助培养本地化人才的过程中促进了成果转化，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能力价值。

① 中国教育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载《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24期，第71页。

② EPIP是工程（Engineering）、实践（Practice）、创新（Innovation）和项目（Project）四个元素的有机结合。

③ 参见世界机器人大会网站，<https://www.worldrobotconference.com/cn/view/2018.html>。

④ 江绛、高洋：《基于EPIP的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以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为例》，载《职业教育研究》2023年第10期，第13页。

⑤ 所谓“双向奔赴”形式的EPIP师资培训，是指既邀请所在国教师来华进行培训，也安排中方教师赴所在国进行培训。

⑥ 《在塔吉克斯坦建成中亚地区首家鲁班工坊——弘扬工匠精神 架起民心相通桥梁（共建“一带一路”·第一现场）》，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13日，第3版。

3. 鲁班工坊与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

推进发展合作各行为体利益共生的参与是鲁班工坊不懈追求的目标。一方面，企业的市场拓展可以带动学校的教学培训——贝宁鲁班工坊的建设就源于在贝中资企业对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另一方面，学校的教学先行也可以带动市场的繁荣和企业的发展——英国鲁班工坊中餐烹饪教学培训所获得的认可和广泛传播就直接推动了利物浦鲁班餐厅的开业运营。英国鲁班工坊不仅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而且已为利物浦带来超过200万英镑的收入。^① 鲁班工坊研究和推广中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合作国的本土企业抑或是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对鲁班工坊有较好的发展预期，85.71%的企业认为，与鲁班工坊的合作对其在海外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29%的企业认为，鲁班工坊对其发挥了较大作用。^② 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有生力量——陈江和基金会以捐赠的方式资助了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建设。^③ 多主体的共生参与体现了“经济人”与“社会人”的有机统一。鲁班工坊建设联盟的成立进一步彰显了由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在资源整合和共识凝聚的基础上合力打造一个关涉全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构建协同关系和强化协同发展是鲁班工坊推进各参与主体利益共生及提升共治水平的实践要义。作为非洲第一家鲁班工坊，吉布提鲁班工坊的探索生动诠释了这种全方位协同关系的面貌。在顶层架构上，吉布提鲁班工坊创立了校企共建的“政政企校校”模式，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吉布提教育部、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和吉布提工商学校五方合力形成因地制宜、产教融合的基本结构；在职业规划上，吉布提鲁班工坊践行校企同考的“招生即招工”模式，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制订并实施招生招工方案，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在教学安排上，吉布提鲁班工坊推行校企同建的“现代学徒制”标准体系，由学校和企业联合政府共同研制教学标准，开展基础知识学习、校外实践基地学习与

① 《英国鲁班工坊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利物浦带来超过200万英镑收入》，北方网，2019年12月25日，<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9/12/25/037885822.shtml>。

② 《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鲁班工坊》，北方网，2022年6月6日，<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22/06/06/052745645.shtml>。

③ 陈江和基金会的创始人陈江和先生曾指出，“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是我作为海外侨胞的一份责任”。参见《架起“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之桥》，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1月10日，第6版。

企业顶岗实习的“1+1+1”人才培养模式；在师资配备上，吉布提鲁班工坊组织校企同育的“双导师教师队伍”建设，由中方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吉方教师的培训方案；在硬件设施上，吉布提鲁班工坊打造校企共享的“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结合了吉布提工商学校多个教学区和亚吉铁路实训基地的有利条件；在软件投入上，吉布提鲁班工坊整合校企同编“国际化教学资源”的优势，共同开发新型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备信息化资源。^① 总之，作为“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鲁班工坊在培育参与主体协同关系的过程中提升了共治水平，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共生价值。

五、结 语

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借助“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有效提升了全球普惠发展，这在鲁班工坊的发展合作案例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视为一项微观研究，从主体间关系和日常生活叙事的角度出发，将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考察和基于个人/人群直观感受的解释看作这种微观研究的重要立论基础。

本文在既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做出了如下三方面理论性探索。首先，本文对全球普惠发展的价值内涵进行了解构，从空间、时间和情感三个维度将全球普惠发展界定为包括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在内的统一体。在进一步明确每种价值类型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赋予全球普惠发展这一相对抽象的概念以具体的可操作化的表征。其次，本文从整体上理解“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将其视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关键抓手。这种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作为结构抓手的“大援外”体系和作为单元抓手的“小而美”项目之间存在互构和相互赋能的关系，这也打破了我们对于“大援外”体系就是“宏大叙事”，而“小而美”项目只能是“孤军奋战”的刻板印象。最后，本文的关键落脚点是提供有关全球普惠发展的关键抓手与价值内涵之间因果作用机制的解释。通过梳理每项作用机制的中间步骤及其可操作化指标，“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推动全球普惠发展的实

^① 《以“鲁班工坊”为平台实践国际化特色现代学徒制》，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网站，2022年4月18日，<https://tzpy.centv.cn/article/1899>。

现过程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展示。

对鲁班工坊发展合作的个案分析丰富了我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全球普惠发展微观机理的认识。鲁班工坊是“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的实践典范。多年来，鲁班工坊建设把满足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直接需求、助力民众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以及推进发展合作各行为体利益共生的参与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民众获取民生“三感”、培养本地化人才和培育参与方的协同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由此提升了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

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全球普惠发展为目标引领，继续深挖“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的潜能，如下三个方向尤为值得关注。第一，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作用，扩展投向范围。应充分借鉴鲁班工坊的成功经验，在数字经济、智慧交通、医疗卫生、新型农业等拥有广阔前景的领域扩展具有“大援外”属性的“小而美”项目。第二，发挥成套项目的积淀作用，深化资源整合。成套项目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和管理办法。具有“大援外”属性的“小而美”项目完全可以依托成套项目的既有基础，在“借船出海”的实践中实现大小项目的平衡推进。第三，发挥“一带一路”的扩散作用，提升国际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沿线国家通过学习、竞争、模仿等机制推动了“一带一路”的政策扩散。^① 应借力提升具有“大援外”属性的“小而美”项目在“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的显示度，助力其品牌塑造和国际影响力提升。

^① 张志原、李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130~160页。